



丁玲

情语

文人妙语系列

岳麓书社

丁玲情语

马会芹
编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情语/马会芹编. —长沙:岳麓书社, 2001
(文人妙语系列)

ISBN 7-80665-087-3

I. 丁... II. 马... III. 汉语—格言—汇编

IV. 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230 号

责任编辑 丁方晓

封面设计 胡 颖

丁 玲 情 语

马会芹 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0,000 印数: 1—4,000

ISBN7-80665-087-3

I·531 定价: 7.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赤岭路 45 号 邮编: 410076

前 言

——丁玲的创作思想和语言艺术

作家丁玲，祖籍湖南省临澧县，1904年10月12日生于常德城内，1986年3月4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82岁。她本来姓蒋名伟字冰之，“丁玲”是她成为作家以前自己取的名字，发表作品时便用作笔名，偶尔也用其乳名晓菡发表文章。

1927年冬天，《小说月报》由叶圣陶先生主持编政，从自来来稿中挑选了丁玲的短篇小说《梦珂》，发表于刊物的头条。1928年春天，《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叶圣陶先生主持下，也享受了和《梦珂》同样的礼遇。从此，丁玲成了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当时的有识之士立即发表评论文章，称丁玲的《莎》作犹如在沉寂多时的文坛绽放了一颗炸弹，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丁玲，传奇色彩颇浓地在中国文坛出没了 60 个年头。可是，她享用创作权利的时间只有 35 年左右。其余的岁月，先是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幽禁于南京三年半。1955 年，她被诬指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基本上不能创作了。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狂飚迅猛地遍及全中国的前夕，“丁陈反党集团”由领导机关基本否定了，有关同志公开向丁玲赔礼道歉。几天之后，丁玲竟被错划为右派反党集团头目！创作权利被剥夺殆尽。此后，她在北大荒劳动改造了 12 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里，蹲了 5 年整；无罪释放以后被安置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老顶山的石头村养老，直到 1979 年平反复出，总计 22 年。

丁玲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蛰居于北京，因为无业而近似流浪，只得靠母亲当小学教师的工薪接济生活。那时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参加领导的蒋介石叛变而归于失败。后来，丁玲回顾说：“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

“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那时候，丁玲“是一个很会发牢骚的人”，作品便“不觉地染上一层感伤”^①的色彩。

1930年5月，丁玲自愿参加以鲁迅先生为旗手、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她的丈夫胡也频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便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她积极要求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她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文学期刊。创刊不久，她在刊物上发起“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1932年伊始，她为这次征文活动写了总结：《对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明确提出创作要“用大众做主人”，但“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人，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作家“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不要发议论，把你的思想，你要说的话，从行动上具体地表现出来。”“不要用已经用滥了的形容词，不要模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说。”“不要好名，虚荣是有损前进的。”“不要自满，应该接受正确的批评。”“写景致要把它活动起来，同全篇的情绪一致。”“对话要合身分”等等，从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面面俱到地表达了她的创作主张，其核心是“用大众做主人”，“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

^① 参看《丁玲文集》第5卷中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和《我的创作生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个”，创作就是“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①。

正确的创作主张当然可贵，但要实现它却谈何容易！为了实现它，丁玲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直到晚年，她仍然常说对自己的所有作品都不大满意。

她在描写自己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知识青年的时候，写起来得心应手，丝丝入扣，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语言不但与身分相合，而且妙语连珠，警句层出不穷。例如写莎菲女士对恋爱的理解 and 自我思想斗争的过程，尤其是描写追求正当爱情的莎菲和倾慕于骑士般美男子的莎菲两相对阵的斗争场面，至今读来仍可令人怦然心动。莎菲终于踢开了那个高贵外型里装着一个卑劣灵魂的凌吉士，回到现实中，慨叹道：“幸福不是有爱人，是在两个人都无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过日子。”也称得上是生活的警策之语。

丁玲在提出“用大众做主人”进行创作的主张之前，曾经全力以赴地描写革命斗争。1929年冬天开始写、1930年发表和出版的中篇小说《韦护》，以挚友王剑虹和革命家瞿秋白相恋和同居，最后分手为素材，但由于对秋白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不了解，所以韦护的形象显得苍白，写恋爱的这部分倒是有些光彩。韦护对丽嘉不辞而别，丽嘉在好友珊珊面前发誓：“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只是我要慢慢地来支撑

^① 见《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呵！唉！我这颗迷乱的心！”孤立地看，这里的描写有一定的形象性，话也比较动听，符合丽嘉的身分，但是，一联系到整部作品来分析，丽嘉的这番誓言是缺少思想基础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小说人物丽嘉思想行为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只不过是脱口而出的豪言壮语罢了。稍后所写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比起《韦护》来，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但没有跳出“革命与恋爱”公式的束缚。

中篇小说《水》写于1931年，是丁玲“用大众做主人”创作的真正开端。小说以当年全国16个省的空前大水灾为素材，像高明的电影摄影师那样，一会儿长镜头，一会儿短镜头，还有特写镜头，生动有力地展现了水灾的严重程度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们的惨状，告诉读者：水灾的祸根主要在于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农民群众在逐步觉醒，在进行自发的斗争，这正是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力量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前途光明的希望所在。作品一发表，评论家冯雪峰立即写文章称赞其为“新的小说的诞生”，“最高的价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其实是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不拘它还有很多的缺点，这无疑的已是我们的艺术的一点点兑现。我们所应当有的新的小说的一点点萌芽。”^①茅盾先生则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不

^① 引自《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①《水》确实“有很多的缺点”，例如只有雕塑般的人物群像而无个人鲜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这是小说作品中的大忌。在充分肯定《水》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二

1936年秋末，丁玲在鲁迅先生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幽禁，经上海至西安，于当年11月中旬之初胜利到达党中央所在的新址——陕西省保安县（后改名志丹县），下旬即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奔赴陕北定边县。从此，丁玲不是一般地投身到了大众之中，而是成了红军战士，奔忙于战争的前沿。她的创作也因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用大众做主人”的广阔大道上迅猛前进。

1936年12月，丁玲作为红军战士到达前线的第一个月之内，便写了散文《彭德怀速写》，并且自画德怀同志肖像，一并发表在1937年2月3日油印出版的《新中华报·新中华副刊》上。这是丁玲成功地描写大众的作品，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个字，但堪称艺术巨制和精品。彭德怀所享有的崇高军威和他所秉赋的丰富的人性及人情，统统跃动于字里行间；闪闪发光的细节描写，更使彭老总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

^① 见《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读者的心中。人们联系到自己所知道的彭老总耿耿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便会自觉地把彭老总作为自己生活和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1937年4月中旬，丁玲写了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作品主人公、掉队的小红军战士实有其人，曾由王震同志委托丁玲照管，小红军称丁玲为干娘。丁玲去世时，他从外地赶到北京送别丁玲同志。现在，他已经离休，享受副军级待遇。丁玲只是把他作为模特儿写小说而不是写纪实文学。匿藏小红军的老太太和村里的群众，都是丁玲心仪已久的大众。在七千来字的篇幅里，这些大众所营造的氛围，特别是小红军请求东北军用刀砍死他而不要枪毙他，以便节约枪弹去打日本鬼子，感动得东北军连长热泪横流，把小红军抱了起来，从而号召自己的弟兄们打回老家去，这个生动的场景描写充分地证明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决策既来自大众，又为大众（包括曾奉命攻打红军的东北军官兵）所衷心拥护，是解放中华民族、消灭法西斯的伟大法宝之一。小红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尤其是他对要杀他的东北军所讲的简单而深刻的话语，不也是人生的警句吗？！

1937年8月，丁玲率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使她难以营造小说作品（仍然写了短篇小说《压碎的心》），但她在行军途中，在工作的间隙里，仍然挥动她的艺术彩笔，写了不少的散文，其中不乏佳构力作，为全面的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留下了历史的画卷。更为重要更有意义的是，这段一年有

余的日子，丁玲在同八路军和老百姓融为一体的同时，深入接触了友军和它的高级将领如胡宗南、蒋鼎文等，并同他们作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她今后“用大众做主人”的创作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1939年1月，丁玲因治疗痔疮住进了延安的拐茆医院。这段生活的素材，让她在半年之后写成了短篇小说《在医院中》。这篇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大众做主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破天荒地“对大众”使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更须牢记的是，这个武器的启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获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表面看来，丁玲只是在批评“大众”，而实质上，丁玲作为大众中的一个，是在进行自我批评，以求得革命根据地的进步、巩固和发展，保证革命大业取得全面的胜利。作品中对于医院领导的官僚主义的揭发和批评，不仅有力地针砭了时弊，而且告诉人们：正是这种官僚主义才使得“大众”安于愚昧落后的现状而不思进取。主人公陆萍，一个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抗战救护工作的年轻女子，学有专长（毕业于上海一个产科专业学校），虽不高深，但对医院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却是属于内行的常识范畴之内，天经地义。陆萍是莎菲女士的晚辈，但她不像莎菲那样游离在革命队伍之外，而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战士了。她在这家医院屡屡碰壁，主要是因为领导成员官僚主义作祟的结果。她慨叹着：“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都这样缺少爱。”最后，她调离这家医院，丁玲描写她的心态是：“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

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这，难道不是对成千上万乃至数以亿计的革命青年最好的警策吗？此外，作品中所描写的打“小报告”的歪风及其所恶化的人与人之间革命关系的严重后果，一直在革命队伍乃至普通老百姓中横行无忌，受宠得荣，岂不令人深长思之！？

1940年春天，丁玲根据一位妇女工作干部讲的一个故事，创作了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第一稿以第三者的身分写主人公贞贞，丁玲觉得不好，撕掉重来，换成“我”直接同贞贞打交道。1941年6月20日《中国文化》将它发表，周扬读了之后给丁玲写信说他流过眼泪，为贞贞的不幸和大幸。十多年之后，周扬又把这篇作品当作大毒草而口诛笔伐，以此作为丁玲反党的罪证，这是为什么？这里不谈，留待日后。

这篇小说更不是一般的“用大众做主人”，它对“大众”所表现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作的批评，既是艺术的，更是善意的，是对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人道主义情怀所作的全新继承和弘扬。作品最大的成就是塑造好了贞贞这个特殊的年轻女子的艺术形象，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也可以说她就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典型，是不能取代的“这一个”。

在漫漫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国人一向信守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教条。女人被丈夫以外的男性睡过，不寻死便决无资格被称作贞女节妇，不能立贞节牌坊倒

是无所谓，而被唾骂不绝，鄙夷不止，则是她们的亲人和后代也难于忍受的。《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怨》，极力哀悼和歌颂遭日寇强暴而自尽的女同胞，目的在于唤起民众化仇恨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坚持抗日战争。这是应该的。但是，问题不能深思细想：倘若中国妇女都像这位女同胞一样，那么，中华民族就难免在悲恸中灭亡。好在这只是个别或少数女同胞才如此刚烈，如此羞愧难当而自尽，更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生的人们中正有人奋起调查和研究日军侵华时期的“慰安妇”一案，准备向国际法庭起诉。然而，不管怎么说，《黄河怨》在实际上没有跳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束缚！至于执笔为文、破口大骂贞贞“不要脸”，并且妄图剥夺贞贞抗日的权利，则是固守封建伦理道德的表现，是自愿和鲁迅《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为伍而已。往昔错了，可到了拨乱反正的新历史时期，不但不认错，反而想方设法加以隐瞒，欺世盗名，继续刁难和攻击塑造贞贞形象的作家，岂不可笑而又可悲！

须知：贞贞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她在遭受性蹂躏之后的觉醒，乃是民族革命战争所唤起的新的美好人性的巨大张扬。一个十七八岁、正在谈恋爱的少女，被日本鬼子掳了去充当慰安妇。她表面上屈服于野兽们的淫威，暗地里却为抗日的游击队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送出情报以后，她接受游击队的指派，自觉地回到野兽群中去，在继续遭受蹂躏的情况下，更加积极地为神圣的全民抗日战争尽力；野兽们折腾她，使她浑身都是病，她回到了霞村的家里，不理睬乡亲们

的鄙夷，不顾父母的挽留，也不希罕情人夏大宝的求婚，而果断地决定和“我”一起到延安去学习，去“重新作人”。如果说，贞贞在遭受蹂躏之前是一块无瑕的美玉，那么，被蹂躏以后的她，决不是什么一般的用于挡风遮雨的瓦，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摧毁了贞贞天赋的美好素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却让贞贞的人性和人情升华到无比美妙的境界。告别家乡霞村，奔赴延安之际的贞贞，仍然是一个小女子，二十来岁嘛，可她所说的那些极为平实的话语，尤其是“人也不一定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情哪能让人人都知道呢？”既是很有个性特色的，又是很好的生活警句。《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独特地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表现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主题，这就是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都早已反复证明：一切非正义的战争，都会毁灭美好的人性。参加这种战争的人，即使在战前很好，是有着正常人性的，也可能在战争中把正常的人性丧失殆尽，变成披着人皮的野兽；否则，要保持原有的人性，例如厌恶甚至反对自己所参加的非正义战争，那就势必付出沉重的代价，乃至牺牲生命。与此完全相反的是一切正义战争都将让参加者和战争的受害者提高自己人性的水平，把本来就美好的人性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坚决为正义战争而勇敢奋斗，直至获得最后的胜利。

1941年2月至3月，丁玲到延安附近的川江口农村体验

生活，并在这里写了短篇小说《夜》，6月发表于《解放日报》，署名晓菡。作品只有五千多字，把“大众”中的一个不脱产的乡干部写得有声有色有高尚的灵魂，在别人难于知晓的环境里拒绝女色的引诱，洁身自好，目的全在于为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为了人民公仆在人民心目中是真正的孺子牛形象。放眼今日之國中，干部竟有数千万之巨，难道不需要借这位乡干部作为镜子，常常照照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吗？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不日，丁玲即组建“延安文艺通讯团”，准备开赴东北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丁玲等人从延安出发，基本步行到达张家口。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关山阻隔，只好留在这里，听候晋察冀中央局的分配。1946年1月6日，丁玲在张家口市青年讲演会上作《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的讲演，反响热烈，深受欢迎。1981年，丁玲回北大荒探亲的时候，在我请农场召集的座谈会上，一位名叫袁银和的农工深情地说起这次讲演。他说，当时他正在内地上高中，从地下小报上看到了丁玲的讲演词，感到很亲切。“解放后，凡是我能看到的丁玲的著作，我都看了。我觉得她是女作家中的佼佼者，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物。她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我很想接近她，但又不敢，怕‘沾色’。时间长了，我发现，她没有作家的架子，

而是同我们农工一样。”

1946年5月，丁玲应《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之邀，主编该报的文艺副刊。7月，华北文联在张家口成立，丁玲主编它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长城》。也是在这个时候，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先到怀来县，后到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改工作。9月，土改结束，由于平绥铁路一带战事吃紧，丁玲离开涿鹿回到张家口候命。在回张家口途中，丁玲对同行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她使用女儿蒋祖慧在张家口街上捡来的废账簿纸，在阜平县红土山村开始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尔后，由于工作和创作的需要，她又参加过河北省唐县和获鹿县宋村的土改工作，到1948年6月初，作品才在正定县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9月，该书由大连的东北光华书店出版。很快便译成了俄、英、日、朝等十多种文字，或连载，或出版单行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约请我们推荐作品参加斯大林文艺奖的评选。当初看过原稿而打“小报告”的人说丁玲这本书有“地富思想”并阻挠它的出版。这时候他不予推荐。是苏联的读者和专家相结合，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为二等奖（1952年）。

丁玲被错划为右派，她的全部作品都被封禁，到了“文化大革命”，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型也被迫毁弃。丁玲复出以后，它和丁玲的其他作品一起，才得以重印发行。

丁玲去世不久，有人只承认和肯定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被否定了，说它是图解政策条文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而丁玲作为作家“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的艺术个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①更有甚者，则是《告别革命》^②一书的两位作者居然宣称：“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把一时的政策作为叙述的前提，是革命文学的通病。这种通病发展到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更极端化了，政治意识具体化为清算意识，鼓动仇恨。文学到了这个地步，离开文学的本性就很远了。”

王雪瑛提出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告别革命》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基本上也属于学术范畴，只不过它具有很强烈很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是必须加以区别的。

本文不大可能同上述观点展开较为详细的学术辩论。这里要说明的是，首先，这些否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论点，正好说明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生命力是强大的，也会是永久的。其次，所谓“鼓动仇恨”，根本站不住脚。须知，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仇恨是一个客观存在；从有地主阶级以来，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而

① 王雪瑛文，原载《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于2000年收进《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一书时，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订。

②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引文见第221页。